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波尔布特政权的错误

本文译者：夏三月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我所见从左翼角度分析柬埔寨共产党历史最严肃的文章，特此译出。1999年发表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非正式机关刊物《获得整个世界》网。标题为《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波尔布特政权的错误》，署名为F.G.。原文链接：http://www.aworldtowin.org/back\_issues/1999-25/PolPot\_eng25.htm 该链接已失效，现可在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IM/AWTW/1999-25/PolPot\_eng25.htm 阅读。

一、本文概述

我们的立场

1975年4月，越南西贡沦陷前两周，一群衣衫褴褛、瘦弱而年轻的农民男女在邻国柬埔寨击败了美国支持的政府。1979年1月，约44个月后，这个新政权被入侵的越南士兵赶下台并被拆散。

这段时期的短暂是其难以理解的部分原因。此外，没有全面的目击报告，甚至连一些基本事实都在研究柬埔寨（或高棉，因为它在该国的高棉语里被如此称呼）的人之间存在争议。一个主要的困难是，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在大部分掌权时间对其政策和目标甚至存在秘不告人，从那时起，他们之中无一领导人出面捍卫其路线。然而，这一时期的迷雾的主要原因是反动的共识已被施加，它已被媒体灌进了人们的头脑，且几乎没有反对声音。

每当提到波尔布特时（通常，考虑到民主柬埔寨政权灭亡已经二十年），结论总是一样的：革命比它声称要治愈的社会弊病更糟糕。许多研究关注的是关于民主柬埔寨时期死亡人数的未经证实的数据，以证明驱赶美国出东南亚的势力比帝国主义者自己更糟糕。1

真相——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是一个大问题。任何不问“我为什么要相信？”的读者对这一问题的使用方式是不完全觉悟的。

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推翻“常识”。与其他错误地声称他们没有特定视角的人不同，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造反有理。”换句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三个印度支那民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对波尔布特政权的结论多么有批评性，事实是他们必须应对美国制造的恐怖。如果有人需在东南亚接受种族灭绝审判，他应当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统治者对前柬共领导人的种族灭绝指控是试图颠倒黑白的努力。

目标

对这一经验的其他分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先前的结论，即它是“非理性的”，因此基本上是无法解释的。我们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它，考察谁在做什么——他们的政治和政策——以及在那个客观形势下可能做的事情，还有这些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关注柬共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的原因。

有四个相互交织的关键问题：

柬埔寨与越南的关系。这个问题限制了柬埔寨革命的整个发展。柬共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与越南共产党（以前称为越南工人党）的冲突，后者试图从战略上将柬埔寨革命置于越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下。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后，在柬共领导层眼中，越南成为他们革命的主要危险。这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客观的和在柬共领导层思想中的。柬埔寨革命的进程取决于此。

柬共寻求建立的社会类型以及群众在其中的作用。这意味着柬埔寨革命的道路，特别是两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以越南为中心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背景下，带来了所有特殊机会和制约因素；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统一战线，包括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在越南阴影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南未能进行社会革命与越来越依赖苏联有关。例如，很多人都听说过民主柬埔寨政府如何彻底清空城市。在这里，我们打算考察这些政策及其实施原因。

党的问题：柬共事物的状态及其领导人对党意味着什么的概念。直到1977年9月，柬埔寨人民才知道他们所谓的“组织”[安卡]、反对者所称的红色高棉是一个共产党。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越南战胜了美国，这个党突然被推上权力巅峰。它还必须处理自身路线和地位远未巩固的形势。

柬共对国外经验，特别是对毛主义的态度的问题。人们常常声称柬共是被毛主义和中国革命指导的。这是基于一点而非全部事实，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蓄意诽谤毛主义的努力。2 柬埔寨党从未提出这样的主张。尽管波尔布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生活在中国，尽管这个翻天覆地的事件，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最远进展，对柬埔寨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自然的影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柬共文件和其他声明中完全没有对文革的任何支持。3 柬共亲中国，因为越南亲苏联（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与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有关系），但是，当柬共文件提到中国革命时，通常会通过与柬埔寨相比贬低它。柬共声称它是如此先进，以至于“胜过了列宁并超过了毛泽东”，4 领导了一场如此“独特”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从国外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5 但是这种经验的“异国情调”并不是柬共领导层不想学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唯一原因。他们不喜欢它的内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所执行的政策与毛泽东制定的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柬共领导人一直保持对中国的保留，直到1977年9月，他们与推翻毛泽东后继者的邓小平建立了热烈的关系。在波尔布特寻找反对越南的盟友时，在中国统治的是什么阶级对他而言并不是很重要。6

与此同时，我们的焦点意味着必须忽视其他重要问题，尤其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国际背景：美国的全部作用（包括它们在被驱逐后对柬共的支持，以及它在柬埔寨的意图），以及苏联的；以及越南的性质和发展，特别是战后。虽然中国是民主柬埔寨政府支持的主要外国来源，但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总结其作用。这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审查中国的更广泛的政策。还需要考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民主柬埔寨的政策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中右翼和左翼的不同目标中达成一致，关于这个话题已有推测，但文档或可靠信息很少。

方法

有人指出民主柬埔寨的几乎所有可用材料（尤其是对非高棉语的人）来自敌对来源。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部分的和相互矛盾的报告（通常来自泰国或其他地方的难民访谈），而采访者本身有时也是公然反动的。但是，柬共确实有一条路线，可以在这些研究中辨明，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学术界翻译和出版的党内文件中。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了一些主要的学术研究，并透过柬共被陈述的路线的棱镜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研究它们。

我们的中心主题是这样的：在风暴汹涌的矛盾之海中，这个社会最终并不比其他任何事物复杂，只是陷入了更为严重形势的阵痛中，只有一种进程可以拯救柬埔寨：革命政治必须体现在物质现实中，一个群众的不断增长的部门的自觉行动主义，可以依靠它来团结绝大多数人民逐步征服旧社会，与印度支那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相结合。这是我们判断柬共的标准，通过研究这一经验，我们加强了对完成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解。

为此，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基于时间顺序的对柬共赢得胜利的背景的考察，第三部分是对其政策一旦实施的分析。第四部分仔细研究了他们在柬埔寨提出的关键理论问题。最后一部分简要介绍了1979年推翻民主柬埔寨之后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柬埔寨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机构手中的命运。

二、胜利的背景

吴哥王国

柬埔寨诞生于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蓬勃发展的吴哥王国。半个千年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这些国王建造的寺庙建筑群（现称为吴哥窟）将成为所有那些寻求升起国旗的高棉国民的身份象征。

当从印度传播出去的印度文明首次被高棉君主占用时，它带来了转变。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兴起使得广泛的灌溉系统建立了，以控制季风洪水并保留灌溉用水。在半年涝半年旱的土地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一些历史学家说，吴哥王国能够掌握旱季水稻种植，每年种植两到三季作物成为可能。高棉法院的财富具有传奇色彩，其统治权向东扩散到湄公河三角洲（现在的越南南部）到海边，北部通过老挝到中国，西部通过泰国和缅甸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寺庙已经成了废墟，因为像水坝和运河一样，它们是由徭役（农民的强迫劳动）建造的，这种剥削秩序无法忍受。人们在吴哥社会制度的核心抛弃了印度教信仰并接受了佛教。

一个强大的暹罗（泰国）从西方施加压力。越南接管了湄公河下游并在柬埔寨大摇大摆。后来的柬埔寨人会说，越南征服者将高棉人埋到脖子，并用热煤填满他们的嘴，将温暖的茶壶放在头顶。无论是否真实，这一形象将成为所有柬埔寨政党的中心参考点。

当法国人在19世纪中期到达时，古老的吴哥王国被雕刻成一条银条。法国开始殖民湄公河所有国家，部分原因是为了挑战英国对中国的控制。1863年，它迫使柬埔寨国王诺罗敦接受一项条约，使该国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以换取他的王位。

法国殖民地

法国人开始（像英国人一样）从鸦片贸易和酒精中获利，但很快这变得不够。1884年，法国炮艇从越南驶向湄公河。他们的军队进入宫殿，使国王实际上签字移交了所有权力。关键是要建立柬埔寨土地的所有制，以便建立法国种植园，同时征收严厉的税收。当农民起来反抗法国人时，殖民主义者从越南带来了军队。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们杀死了20万人，占人口的20％。诺罗敦最初曾呼吁起义，但两年后再一次为了保留他的王国背叛了它。

法国人带领越南人管理柬埔寨，除了王室外，他们没有培养当地精英。在柬埔寨收取的税款用于支付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管理费用。法国人通过将高棉人贴上懒惰的标签来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当的，“堕落的竞赛”。与越南不同，法国发现为了利润和整个东南亚帝国的利益而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是很方便的，除了橡胶种植园和其他出口导向的作物外，柬埔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开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持灌溉系统。法国进口产品扼杀了民族工艺品（丝绸和棉织）以及新兴的当地工业。征税导致了高利贷者的扩散，因为之前没有与市场联系的农民不得不借钱来支付这一贡品。土地分为越来越小的地块，许多农民成为债役工，被迫为他们所属的其他人工作，而不是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人均稻米产量降至东南亚最低水平。

国王的孙子诺罗敦·西哈努克被维希法国政权加冕为国王，然后在随后的日本占领下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邀请”法国回归。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变得越来越苛刻。皇家宫廷变得非常臃肿。在农村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马德望和柴桢，地主变得猖獗。总的来说，不再拥有土地但作为租户或佃农生活的农民的数量正在加快增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到1970年西哈努克统治结束时达到了大约五分之一。虽然大部分农民仍然拥有一些土地，但是许多家庭的土地面积不到一公顷（被认为是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限度）并且不得不租用土地和工具。绝大多数人负债于放债人和店主。许多农民欠他们一年多才能挣到的钱。放债人员通常每月收取12％的利息，并与交易员合作，他们会在丰收的季节开始时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大米，然后在食物用尽的季节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卖回并向农民提供信贷。绝大多数，这些贷款人和商人都是中国人或中高棉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社会关系阻碍生产力时，工具通过人民说话。对这些社会关系产生了抵抗，这些社会关系在曾经富饶的土地上被认为导致人民陷入贫困。

佛教僧侣在19世纪与法国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佛教窟（寺庙）成为全国抵抗的中心，首先是反抗法国人，然后反抗日本人。虽然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主要支柱，但佛教教会也是唯一的教育来源（法国人没有建立学校）、精神生活的中心和除君主制度之外唯一的真正国家机构。大多数年轻人作为僧侣度过了几年时间。这意味着修道院培育了各种政治趋势。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1930年，随着世界革命之风的兴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背景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指示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该党的核心在越南，共产主义运动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运动。老挝曾是并仍是最不发达的印度支那国家。在柬埔寨，起初唯一的党员是东部的越南橡胶种植园工人和中产阶级的中国城市居民。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由佛教领导的反殖民运动之后，党开始招募年轻的僧侣，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和领导人都是前僧侣。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场独立斗争。不久后，越南人发动了反抗法国人的武装起义。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议越南人和中国人不要通过革命战争寻求民族解放。两党都没有同意。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越南革命者的主要外来支持来源，就像他们在同一时期为对抗美国入侵的朝鲜人民所做的那样。当越南人在1954年驱逐法国时，美国支付了法国在这场冲突中80％的开支，他们认为这是包围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解散后，越南人组建了自己的共产党（越南工人党[越工]，1976年更名为越南共产党）。他们也有自己的军队。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的情况非常不同。柬埔寨革命者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不如越南同行那么发达。他们对越南的外部依赖与他们有小而明显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实匹配。柬埔寨人不建立共产党，而是遵循越南的建议，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高棉人民革命党。他们不是组建自己的军队，一支围绕革命的直接任务团结起来的军队也将成为共产主义长期目标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训练基地，他们只是与佛教徒和民族主义伊萨拉克游击队（曾出现在与日本的斗争中）合作。换句话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者都好像那里的任务不是要组织革命（这场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那样对待柬埔寨，而只是作为越南人的斗争的附属物。

越南工人党领导层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理由，并赢得了许多柬埔寨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柬埔寨的条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们说，许多柬埔寨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社会对抗在那里得不到充分发展。他们认为，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注定要软弱，因此他们总是必须扮演父党。1951年的越南工人党文件说：“越南党保留监督其兄弟政党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活动的权利。”8

以下矛盾为未来几十年留下痕迹：一方面，越南运动势头强劲，将柬埔寨运动推向前进；另一方面，柬埔寨人的弱点适合越南人，他们试图将这种弱点制度化。越南人要承担主要的战斗负担，首先是对抗法国人，然后是美国人，伴随着所有必要的英勇牺牲，同时他们要把邻国的斗争从属于他们自己的斗争。是否在战术上这样做是一个问题（例如，是否为了整个印度支那斗争的利益集中力量在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等等），但是越南工人党将这变成了革命的战略，除非通过越南干预，否则柬埔寨或老挝永远不会发生革命。

越南人在奠边府的战斗中围困并完全摧毁了法国殖民军队。法国被迫接受1954年从越南谈判撤军。日内瓦会议阐明了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条件：越南分裂，北方有革命政府，南方计划选举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柬埔寨的情况更加含糊不清。伊萨拉克运动根深蒂固，战斗人数数以千计。但西哈努克，正如他经常做的，玩了两面三刀。他说服法国人在1953年给予柬埔寨独立，告诉他们他们要么与他打交道，要么将柬埔寨输给法国人正在越南与之战斗的共产主义者。在日内瓦会议上，他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保证他的政权的继续，以换取柬埔寨的中立。

苦涩的教训

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空手而归。他们有义务解散他们的武装部队。约一半革命活动分子（约一千人）离开柬埔寨，前往越南北部的船只以及在柬埔寨作战的越南军队。越南的部分胜利对柬埔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这一经历对柬共未来的领导核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那些在巴黎大学度过这些战争年代的人，还是那些像波尔布特一样及时回归，看到他们的希望完全受挫的人。

这是所谓西哈努克时代的开始，国王放弃了他的父亲，成为一个单纯的亲王，并通过议会演习、固定选举和暴力的组合管理国家，直到他在1970年被推翻。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在美国拒绝允许越南南部承诺的选举，1959年越南人重返武装斗争后，就变得更加复杂。西哈努克首先宣布他所谓的“高棉社会主义”，后来是“佛教社会主义”。他的学说的实质是保留“保护我们的种族、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宗教信仰的原创性的障碍，并保障我们对某些邻国的独立性”。 他解释说，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在柬埔寨的胜利”。9 他的意思是他所说的：他的政策的目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为了使他的统治及其代表的整个制度永久化。

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建立了合法的人民党并参加了1955年的选举。一位观察员写道：“人民党最大的成就是在选举中暴露自己所有左派人士的姓名以填充警察档案。”10 该党被允许合法存在，一些成员在政权内部秘密工作，但西哈努克实施了一项无情的政策，即追捕和谋杀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农村。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业工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西哈努克转身粉碎了罢工运动。他的警察在办公室门前的人行道上肆无忌惮地谋杀了人民党报纸的出版人。在公开前往政府之前，党的领导人秘密向西哈努克的警察出卖了几年的信息。据说，农村地区90％的党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失踪。许多人被敌人杀死或散落；其他人只是漂走了。柬共的历史草案将大部分损失归因于党内普遍存在的消极态度。11

柬埔寨共产党成立于1960年。当时它被称为柬埔寨工人党，就像越南党一样。它是秘密的，它的存在是秘密的；公开地，它通过合法的人民党工作。与西哈努克的奇怪舞蹈在继续；亲王提拔两名主要的共产主义者进入内阁，一名进入立法机关，但党的主席被绑架并被谋杀。1963年，学生暴乱以反对警察镇压。作为回应，西哈努克公布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并承诺消灭他所谓的“红色高棉”。

在此期间，国外事件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哈努克对1963年迪姆（译者注：即吴廷琰。）（一位因被认为不再有用而被美国中情局在南越杀害了的美国小人）被谋杀感到不安。亲王与美国决裂，并与北越政府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使用柬埔寨领土，以换取承诺尊重柬埔寨的边界。12 柬埔寨共产主义者，据说，他们已敏锐注意到了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崩溃。合法、开放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希望通过与民族主义苏加诺政权的联系，在没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实现解放；政权和党反倒都被美国组织的右翼政变压垮，无数人被屠杀。

波尔布特成为主席

1966年柬埔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的名字改变了，波尔布特成为了柬共的主席。大多数党的领导和大部分的行列和人员（包括许多学生和教师）都退到了农村。重心开始转移，首先到达东部边界，在那里与越南共产主义者重新建立了联系与合作，然后到了腊塔纳基里省，在孤立的东北山区。党开始在农村建立秘密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它赢得了长期遭受中央政府蹂躏的部落山区人民的支持。通过这些举措，柬共正在远离越南党，越南党仍然认为柬埔寨没有革命形势，因此危害与西哈努克的合作是错误的。13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埔寨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受越南战争的制约，这种升温加剧了柬埔寨内部矛盾，使之到达突破点。

中国通过柬埔寨港口向越南提供武器。西哈努克从顶部拿走一定比例。同样，大量的柬埔寨大米被出售给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这对西哈努克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代表大米出口税的政府收入损失。他引入了一种称为集的系统，根据该系统，政府士兵前往村庄并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他们出售大米。在萨姆鲁特，在马德望附近的西部，农民起身攻击军事岗位。柬共虽然集中在该国的另一端，但支持这一叛乱。

波尔布特后来解释说，“正是在这个成熟的革命形势下，1967年在萨姆鲁特爆发了一场武装起义……这是人民通过他们自己的运动引发的。党中央委员会尚未决定全国全面武装暴动。”14 事实上，党尚未正式改变自60年代初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更折衷主义的路线，即“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并不清楚党在何种程度上团结起来与其过去实践完全断裂。（据说柬共的东区尤其不情愿。）但是环境使然。“我们党尚未提出武装斗争的原则，但在面对敌人的这场大规模内战时，我们党必须用武器反击。”15

西哈努克使用中国人给他抵抗美国的飞机轰炸了柬埔寨西部的村庄。他把他所采取的枪击作为与越南人合作对付柬埔寨农民的代价。他承担了一项命令的公共责任，这项命令要求所有被捕的反叛分子当场执行。亲王吹嘘他们会被烤，并喂秃鹰。他指示电影囚犯被砍死，并在城市的影院上映这些新闻短片。在农村，他的部队在杆子上留下了断头，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叛乱从四月持续到五月。

现在，柬共开始认真组织全国性起义。1968年1月，它发起了第一次进攻。这时，革命者只有很少的现代武器，党的领导层不得不再次逃离西哈努克的部队，但内战已经被释放。

越南人不欢迎这种发展，但与柬共的合作仍在继续。民族解放阵线为1968年2月春节攻势的准备心事重重，一个或全赢或全输的对城市叛乱的赌博，其失败说明了依赖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大措施的末日，和目标是协议解决的更加常规的战争的开始。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哈努克、柬共和越南人正在走向三方联盟。

美国在柬埔寨的“秘密战争”

1969年3月，美国发起了柬埔寨“秘密”轰炸行动。恐慌的西哈努克邀请杰基·肯尼迪（美国总统的遗孀）访问并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但现在为时已晚。1970年3月，西哈努克的总理，朗诺将军（从一开始西哈努克就依靠他镇压共产主义者），在美国策划的政变中推翻了他。4月底，美国入侵柬埔寨。来自南越的约3万名美军和4万名士兵在柬埔寨东部横行两个月，宣布其目的是铲除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士，后者向西移动以避免决战。西哈努克逃到巴黎然后去了北京。中国提出支持他，条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几天后，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其核心是红色高棉）的负责人呼吁柬埔寨人民武装起来。他还呼吁召开一次峰会，将印度支那民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西哈努克被任命为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流亡政府的国家元首，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对西哈努克在解放后政府扮演的角色沉默。

那时，柬共有约5万名当地民兵战士和一支5千人左右的军队。这将在一年内翻番。两国解放部队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他们的装备很差；他们依靠俘获的美国武器和中国人或越南人提供的武器和弹药，”当时在金边担任记者的美国作家说。16 但她补充道，“时间是越南人给予他们的主要援助，他们有效地使用了它。”

显然，这一过程有两个方面。柬共必须逐步建立其武装部队，除了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外几乎无所依靠。据所有认真观察者说，这种支持是广泛、深刻和强大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解释革命军队的稳定扩张，到1973年已经达到4万人。甚至他们从腐败的朗诺官员和军官那里购买大量的材料和武器也证明了他们从橡胶种植园工人那里获得的支持（他们让他们卖掉了橡胶）。但越南人在1972年底完成了对朗诺军队的大部分战斗，到那时他们打碎了反动派的牙齿。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越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否则，当时就不可能解放柬埔寨。

到1973年，越南人迫使美国进入巴黎的谈判桌，他们希望柬共加入他们。越南人寻求并赢得了轰炸的停止和美国军队的撤离。美国不愿意承认失败，战争将持续两年多，但他们已经为他们愿意为取得胜利冒的险设限。在整个美国的印度支那战争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关头。但就他们自己的直接战争目标而言，柬埔寨人认为没有理由同意停火，停火只能减轻他们对一个孤立的金边的束缚，而金边似乎即将落入他们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朗诺渴望停火，即使柬共没有参加巴黎协议，以及为什么柬共拒绝这两项提议。

正如两支印度支那解放部队在巴黎谈判时期的直接目标不同，直接结果也大不相同。美国从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放松柬埔寨。恰恰相反。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再也无法轰炸越南，在那里他们希望美国的大规模支持能够让反动政权坚持“体面的间隔”，但他们担心红色高棉的胜利迫在眉睫。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称轰炸柬埔寨是“镇上唯一一场比赛”。17

柬埔寨大部分地区被宣布为“自由开火区”。18 巴黎和平谈判于1月举行；2月，美国将战机送回柬埔寨。在每天的突袭行动中有25万吨炸弹落下，共持续140天。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全面轰炸中落到日本数量的三倍多（这次轰炸最终导致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破坏）。目标是在金边附近建造防火墙。它确实使朗诺政权获得了两年的喘息机会。

在最好的时期，两个印度支那党之间发生了摩擦，现在关系迅速恶化。据柬共说，越南提议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和部队，但柬埔寨人更愿意保持独立。19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和形成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后，越南人开始送回数百名在越南北部流亡15年的柬埔寨人。越南人想在柬埔寨建立革命力量，但他们希望通过在柬共内建立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返回的柬埔寨干部中许多人都接受过越南的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培训。起初他们受到欢迎并融入柬共主导的单位。几年之内，几乎所有人都被从党内移除，许多人被处决。“在河内受过训练的前战斗人员小组”，1976年的一份文件后来说，“……成为100％的越南人，没有留下任何高棉人成分。他们是越南人的顺从的仆人。”20 这一痛苦的矛盾反映在柬共本身内部，因为柬共西南区的部队与柬共的东区指挥部之间爆发了交火，被认为亲越南人，“高棉身，越南心”。 在西南区，据说领导层告诉人们有两种敌人，严重的和不严重的。 “越南人还不是我们的严重的敌人，也就是美国-朗诺，但当时据说越南是我们的第二号敌人。”越南经常被称为“世袭敌人”。21

水稻战争

如果说柬共支持下去几乎全靠人民支持，那么美国支持朗诺政权就几乎全靠B-52了。甚至他的美国顾问也认为他的政权是一场灾难。它是如此腐败和无能，以至于其花名册中多达一半士兵并不存在，仅仅是为将军们支付工资的装置。按比例，他的军队的将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都要多许多倍。面对持续的美国地毯式轰炸，柬共和越南人一样，使用了一种有效的战术：它的战士尽可能地靠近政府部队。大多数伤亡人员是平民；此外，爆炸物和凝固汽油弹破坏的残迹使农村的广大地区变成了荒地，而健全的年轻人则不得不为一方或另一方而战。人民和军队的喂养问题对双方而言日益尖锐。稻米骚乱震撼了难民——充满了金边。到目前为止，美国不得不大量供应大米。朗诺的生存全依赖于此，以至于美国大使馆每周都有关于大米库存的报道。

在一些解放区，尽管有轰炸，稻米产量还是有所改善，但战争的需求超过了供应。在此之前，从支持美国—朗诺政权的地主和其他叛徒手中夺取的土地被分别分配给无地农民家庭。农民热情地加入了互助小组，每人都帮助耕种了所有土地。该国一半人口居住在解放区，由农民协会和爱国僧侣协会等群众组织管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存在仍然是秘密的，就像党本身一样，党通过其执行大部分的招募工作。）虽然商人继续进行交易，但取消了对稻米作物的放贷和借款。农民不再受到腐败、强奸、盗窃、酗酒和赌博的困扰。在一些地方，农民自愿组建了10至30个家庭的合作社，提高了生活水平。

1973年5月，安卡发起了其所谓“民主革命”。现在，这些合作社将被提升到“更高层次”，并实现普及。合作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私人财产基本已被废除。解放区的城市也是如此。

柬共内部出版物《革命旗帜》后来解释了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有进步，另一方面有旧社会……那些拥有土地的保持他们的私有权，从前的无地农民和从前的无地工人现在从[革命]国家获得土地。因此，土地一般保持私有制。”在东北部城市桔井，柬共领导的解放区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是他们[买办资本家]的卫星。”“桔井乡镇显示出与旧社会相同的迹象。本田摩托车像以前一样在街道上加快速度，而我们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则在尘土中行走。这表明他们仍然是主人……如果我们继续这条道路，我们就无处可去。”22

桔井完全被疏散，变成了鬼城。在农村，废除了金钱、信贷和贸易；大米和其他基本产品直接由新国家收集。土地、农具、汽车等私人所有权消失了。

正如上面引用的柬共文件所承认的那样，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完全没收私人财产，当时的任务是团结所有可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权的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爱国的大资本家和地主，他们的存在与反动社会完全相关，但有时可以赢得他们以针对主要敌人（如西哈努克本人）行动。此外，无论财产是属于封建地主和种植园主（最终是革命的目标）还是农民，都同样对待，谁都只能通过夺取土地来赢得自己对这些势力的解放。那么，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波尔布特后来描述了这样的目标：“土地所有者和商人把所有的大米都收集起来卖给了朗诺集团和越南人。我们人民的贫困阶层用完了大米……高棉的革命军队正在前线作战，他们用完了大米，每顿饭都喝米汤……这就是为什么在1973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整个解放区的下级和上级建立合作社。”23 另一位柬共领导人更坦率地解释了1973年的决定：“越南人是最大问题。他们会买大米。所以我们废除了钱。如果人民不需要钱，如果他们住在国家为他们提供一切的合作社，他们就不会向越南人出售大米。”24

这些措施是在绝望的战争岁月和革命热潮中采取的。显然，他们并没有在解放区的任何地方进行，也不是一次性进行。在某些地区，它们只施行于先进的村庄；在其他人中，它们是所有人的义务。但它们不是临时性或战术性步骤；相反，他们预示着柬共政权即将到来。柬共的主要特征以及由其统治引起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出现，它们之间的特殊混合方式也是如此。

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四个问题：

第一，柬共对越南问题的处理：越南人对柬埔寨革命的蔑视，并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之下，这成为制约柬埔寨革命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条件，一个外部因素，不能过分强调，因为这个外部因素并不能决定柬埔寨革命者的反应。

应该记住，两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军事联系和相互渗透使越南人有可能影响柬埔寨斗争的进程，但相反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越南工人党的一条越发错误的路线对柬埔寨而言是个大问题，它会证明这对越南人民来说更是灾难性的。25 越南是柬埔寨革命的一个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美国在那里被击败，而且那里充满了为反帝斗争牺牲一切的人。许多柬埔寨人居住在越南，反之亦然，这一事实是一扇潜在地敞开的大门，柬埔寨的革命路线可能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但柬共无法看到这一点。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形势的消极方面。他们无法超越他们自己对柬埔寨国家利益的构想，不只越南修正主义者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应该关注柬埔寨革命。为了回应越南人的路线，这种路线倾向于减少印度支那在越南革命的斗争并在其他两个国家支持这一斗争，柬共同样无法看到在整个印度支那传播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与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包括毛主义中国，这一形势下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二，这当然提出了他们想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的问题。在柬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政治权力的几年里，这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但是，1973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已经预示着要求跨越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这一阶段在全国解放后采取了惊人的形式。目标是扭曲的：不是将革命火力集中在美国和朗诺政权上，在一个大多数人拥有某些财产的国家，私有财产被普遍宣布为敌人，最大的羞辱被描述为一些中产阶级年轻人有摩托车，而红色高棉战士在尘土中行走。（请注意，对于《革命旗帜》来说，从前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事实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激发他们的热情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相反，结论是他们的土地应该被没收。）柬共无法想象将印度支那人民团结在一个革命基础上的可能性，因为无法理解在柬埔寨革命中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重要性。

第三，另一个严重的预兆是处理党内的矛盾（特别是对来自越南的返回干部的不公正处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柬共中反对“越南”影响的斗争实际上是柬埔寨党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努力在与主导的非革命路线冲突时制定革命路线。但是，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的，所以它被错误地概括为主要是与外部敌人（越南和“越南心”）的斗争。这种总结本身成为党的发展的巨大障碍，破坏了曾胜利的革命取向。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政治上的直接对待（这能加强柬共的理解和统一），这种情况削弱了党。不是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系统化这种方法。

最后，柬共需要批评越南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路线，越南党的方向从未坚定，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轨道。这种批评对于澄清柬埔寨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团结党是必不可少的，但越南和老挝也同样迫切需要这种批评。这是“国外经验”的一个方面，柬共冒着失去自己的方位和引领任何革命的能力而忽视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是毛的对以苏联为主导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争论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发展的总结，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经验。但是，他们不是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对越南沙文主义作出反应，使这种矛盾不可解决。尽管柬共对广大柬埔寨人民的非常真实和公认的领导及其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宝贵的和英雄的作用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为柬共在战争过程中形成了一条巩固的路线，它正朝着死胡同前进。

三、被浪费的胜利

解放

金边的解放于1975年4月17日到来。最后一次袭击是在今年的第一天开始的。革命军队切断了连接金边和西贡的一号公路。他们在湄公河上的电缆上串起了中国供应的水雷，并在船只接近时把它们拉起来，切断了这条路线。重型榴弹炮（由越南人提供，从美国人手中夺取）摧毁了首都机场，这是与美国的唯一联系。由于担心其大使所谓的“不受控制的解决方案”，26 美国让朗诺流亡并试图与西哈努克分别达成协议，如果他结束与柬共的联盟。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也许是因为为时已晚。被憎恨的反动军队——在城市像在农村一样强奸和抢劫的军队——崩溃了，而由柬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包围并封闭了城市。约6万人，其中包括几个营的妇女，与当地民兵中的更多农民一样，革命军队比朗诺军队小几倍，但在柬共的领导下，其事业的公正性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

美国和他们的傀儡政权曾试图将这场战争描绘成拯救柬埔寨免受越南侵略的战争，但现在，柬埔寨现代史上第一次完全掌握在柬埔寨人手中。即使是在金边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不得不承认，“1975年4月17日到来时，[朗诺]共和国地区的人们欢迎投降。”27

然而，可以说，那两个不同的柬埔寨，或两个不同的部分，经历了分歧的发展，当天碰面。首先在法国人统治下（甚至之前），然后在经济繁荣的西哈努克时期统治下，金边像许多第三世界城市一样，一直是一个与国家其他部分不同的城市。它的经济关联于外国资本，关联于大米和橡胶出口以及少数制成品，其主要角色是作为外国商品的仓库和分销点。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大多数人口是柬埔寨人，但非高棉人，尤其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在从法国独立后，西哈努克以其“现代化”情绪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城里穿着传统农民服装或赤脚。在美国地毯式轰炸年间涌入的数百万难民改变了这一点——将该市的人口增加一倍，达到约200万——但与此同时，它变得与农村更加隔绝。虽然数百万农民在占领金边时已经成为革命一部分许多年，但首都人民几乎完全是依靠反动战争或美国大使的妻子分配的慈善机构中生活的，而她的丈夫导演了国家的毁灭。

被解放部队占领的城市在任何直接意义上都不是奖励。武器和弹药库存很少，没有战斗机或坦克或重型火炮。没有原材料，没有备件，缺乏燃料，几乎没有电。大部分城市都没有水。没有药品或其他医院用品。最重要的是，没有食物。手头的大米仅足以供应城市不到一周。

整个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朗诺政权已表示其身边有50万人死亡；据报道，另有60万人在解放区被杀（柬埔寨总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成千上万幸存者严重受伤或残废。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出的最后一份报告称，柬埔寨“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重要的大米出口国到大规模进口国，1975年4月结束时，在饥饿边缘”。28 至少有一半稻田是被炸弹刨了个遍的或未种植的。美国空袭和战斗杀死了用于拉犁的大部分水牛，以及牲口和其他农场动物。该国几乎有一半的人口被赶出了家园。国家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被破坏了，河流被沉没的船只堵塞了。

在这些环境下，解放部队几乎在他们进入的同时撤离了金边和其他主要城市。此外，他们无法知道美国是否会重新进行轰炸袭击。越南的战争仍在肆虐。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即5月12日，美国将发动马亚圭斯事件，其中在柬埔寨水域捕获一艘载有军事物资的美国货轮是美国另一次袭击的借口，摧毁了大多数柬埔寨海军设施并摧毁了全国唯一一座位于甘榜宋的炼油厂。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出版物都在哀嚎这次撤离是一场死亡行军，但即使是最不利的报道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形容它说，“事实上，这是一场远离死于饥饿的旅程……[这]在城市中心已经成为现实。”29 解放战士挨家挨户地要求人们尽快离开，可以收集他们的财产。没有暴力。人们走出城市的家庭，在途中获得食物和饮料。一些药也被分发。的确，正如西方媒体所抱怨的那样，伤者和病人都从医院撤离，但至少目前，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情况更坏。被捕获的高级官员和朗诺政权官员被处决，但是，关于前士兵大规模处决的唯一报道来自马德望和西北区的其他地方，党中心很快命令他们停止。由于美国媒体在美国失败后领导了对“红色高棉暴行”的抨击，似乎只能引用美国驻泰国大使馆（负责“监控”柬埔寨的事件）的一份一度机密的报告，报告表示，在第一个月之后，“关于故意杀害前政府官员和士兵的报道或多或少已经结束”。30

然而，清空城市并不是一项战时步骤，甚至也不是对无法维持的局面的必要调整。组织出走的战士告诉人们，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但也不是注定的。在1975年5月的党内会议上，决定一劳永逸地终结城市。撤离是完整和永久的。后来，一些技术工人被召回，农民被派去替换工厂工人，一些政府办公室和外国大使馆重新开放，但近四年来，首都的生活部分减少到几个方块。其余部分被清理干净然后遗弃到杂草中。

疏散城市只是解放前几个月通过的更广泛计划的第一步。市场、私有财产、金钱和宗教被废除。清空城市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决定性举措。“如果我们保留了金边，”柬共在其内部机关中写道，“它[私有财产]会有很大的力量。当我们在乡下时，我们比私有部分更强大，影响力更大。但在金边，我们将成为他们的卫星。”31

“独特”的革命？

柬共非常清楚这与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经验背道而驰。一份柬共内部文件指出：“驱逐金边人口是一项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革命中都找不到的措施。” 外交部长英沙里后来向一位外国记者解释说：“高棉革命没有先例。我们尝试在历史上从未做过的事情。”

事实上，柬共领导层认为他们的革命是独一无二的。7月，波尔布特在3000名军队代表的会议上说：“我们赢得了全面、明确和清洁的胜利，意味着我们在没有任何外国联系或参与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我们敢于在与世界革命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斗争……在整个世界，自革命战争出现以来，自美帝国主义诞生以来，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军队，能够赶出最后一个帝国主义者并取得对他们的全面胜利。没人能。”33

波尔布特正在作两个需要解构的独立主张。首先，没有其他人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韩国和越南呢？看来，这里的真正意思在于将柬埔寨与越南进行对比，越南已获得苏联和中国的援助，因此赢得了不洁的胜利。确实，越南领导曾在每一方面（包括军事学说）都背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使越南摆脱美国魔掌的斗争中妥协了，将他们的灵魂卖给了同样帝国主义的苏联。（在苏联集团垮台之后，这种路径导致他们再次落入西方手中。）但柬埔寨并没有独立于世界背景而获得解放。34

第一个主张以其公然的民族主义而与第二个主张密不可分，这是正确的：柬共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课程（基于历史的和世界范围的经验）适应于柬埔寨的具体和独特的条件，而是以“与世界革命完全不同的立场”进行。从欧洲返回的柬埔寨人讲授“高棉革命的优越性，特别是因为取消了金钱和撤离城市”。35 这显然是对中国革命的批评：“中国人现在向国家工人支付工资，等等。工资导致私有制，因为当你有钱时，你存起来购买这个或那个。”36

差异点——柬埔寨的独特性——是斗争不是针对旧的统治阶级（这些阶级被认为是无可挽回的败坏了），而是针对所有私有财产以及所有被其污染的人，包括城市中的所有阶级。“我们已经镇压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我们继续打击他们。我们也打击了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的私有财产……我们从城市疏散人民是我们的阶级斗争。”37

这场“阶级斗争”的另一面是对从城市撤离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该国的人口分为两类，“老人”（1975年4月以前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人）和“新人”（居住在朗诺控制地区的城市居民和农民，约占人口的30％，根据一份柬共文件，38 而根据其他计算，接近40％。39）

有益的分隔

这两个类别与社会阶级不对应。在第一类中有非常不同的阶级，从贫穷和无地农民到富农（通过解放，大多数非农民逃离农村）。第二类包括更广泛的阶级，从资本家和封建主，到店主和知识分子，到工业工人和人力车司机。40 这种分类也不属于任何政治类别，因为它把同情革命的人和反对的人扔到一块。例如，几乎所有柬埔寨的中国少数民族（约43万人），现在都位于城市，被标为“新人”，将大大小小的放债人、店主和学生混在一起。许多中高棉学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变得激进。（西哈努克已禁止柬中友好协会，即使他正在接受中国援助。）说中文是被禁止的。

事实上，学生为柬共提供了重要支持和许多成员。直到1954年，中等教育一直非常有限。（与波尔布特结婚的希留·庞纳里是第一位从世俗中学毕业的柬埔寨妇女，后来她自己运营中学以为柬共领导人提供工作和收入。）徒劳地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没有革命地现代化，西哈努克花费了国家教育预算的四分之一，培养了一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工作或未来的前景，对革命思想持开放态度，尽管直到解放，党多年来一直没有在城市开展群众工作。所有这些人都被标为“新人”。

许多来自村庄的人最初可以自由返回那里，其余的则集中在许多地区，特别是西南区和东区。所有人都到合作社中，和其他人一样，都去了田间工作。但这两个类别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合作社既是政治单位，也是经济单位——它们是基本地方政府、唯一的群众组织和几乎所有日常生活都在其中组织的形式。“老人”是“全权成员”。“新人”不是。他们不能成为领导合作社的委员会或任何其他职位的候选人。次年，在国家统一和体制建设的表现中，国家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不被允许投票。党的文件描述了将“新人”进一步划分为“试用成员”和“存放者”。目前尚不清楚这项政策多么广泛或有多少后果。但党的文件本身所做区别不大。“新人”被预计最多只能保持中立，如果都是敌人，也不会潜在地进步。41 他们经常被告知：“保持你没有收获，失掉你没有损失。”

有大量证据表明，“基地人”（通常称为“老人”）认为“新人”是一种负担，无法很好地耕种。在某些地区，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和良好的待遇。在其他地区，他们获得的食物较少，住所最差和待遇严苛。最初他们集中在党最强势的地区。1975年9月，第二次大规模流亡发生了。“新人”通过步行和铁路从西南和东部送到人口较少的北区和西北区。约有80万人被送往西北区，几个月内西北区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这里的条件变得特别苛刻。

一个新的国家宗教

与此同时，柬共还开展了另一次大规模人口转移。在此之前，被恰当地描述为“佛教法西斯主义”的朗诺政权发起了针对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族人的大屠杀，这是对越南“提摩斯”（梵语中的“异教徒”一词——这个词是为了攻击越南人成为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同时也结合柬埔寨民众对越南人的蔑视，因为在柬埔寨人看来，他们向基督教投降了）的圣战。30万农民定居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越南人被美国傀儡政权掀起的种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暴乱驱逐出去，利用了早期几个世纪越南占领时积累的敌意。柬埔寨解放后五个月内，剩下的15万名越南族裔大部分也被移置越南。民主柬埔寨政府将他们称为“越南派遣偷偷潜入高棉的越南居民，他们生活在隐藏的地方，与全体居民混在一起”。42 在未来几年里，剩下的1万人（主要是高棉配偶和家人）很少有幸存。

民柬政权所针对的另一个非高棉少数民族是占族，一个数十万人的穆斯林族裔，他们有着独特的习俗，生活在柬埔寨各地，特别是沿河。除了钓鱼之外，许多人都是屠夫（一种佛教徒喜欢留给他们的职业）或小商贩。他们被认为是凶悍的战士，在战争期间，双方都招募了许多占族士兵。据说，他们最初支持红色高棉，因为他们在佛教政府手中遭受歧视，但是他们在1973年之后反对革命者，他们的语言、独特的着装、宗教和宗教服饰（如胡须）在新的合作社中被禁止——然后朗诺政权转过身来取悦他们。43 虽然作为一个特别传统和虔诚的团体，他们倾向于反对革命，可以肯定的是，当新政府迫害他们时，他们暴力抵制，有时杀死柬共干部，高棉人和占族相似。他们的村庄被拆散，他们被分散在合作社的“新人”中。只要他们吃猪肉（一项反复施用于他们的测试）并放弃他们的习俗，就没有企图消灭它们。但他们被迫接受高棉化。43

然而，高棉少数民族（“上高棉人”或丘陵的部落民族）被视为“真正的”柬埔寨人，他们的黑皮肤与“白”中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人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宗教被法令废除，但是柬共毫不犹豫地依赖于最为落后的宗教和种族偏见，这些偏见是在（不是非常）新的国家宗教中综合起来的：高棉优越性。

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另一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否察觉到，它也代表着不愿彻底打破传统观念。民主柬埔寨政府没有重复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口号，但他至少在名义上是新国家的元首（直到1977年9月他悄然退休），整个共产主义（西哈努克经常谴责这是对佛教的不忠）的概念从未被公开提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组织”只是统一战线中更民族主义和激进的组成部分，佛教君主是表面上的领导者。

社会主义计划

解放后不久，新政府宣布旧的朗诺钞票不再是合法货币。印有吴哥窟寺庙形象的新货币已经印制出来，但在最后一分钟，政府决定不将它们投入流通。他们宣布，金钱是柬埔寨的历史。

这是一项激进的措施，但不是一项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决定。

一方面，它不仅仅是基于对马克思所谓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它将所有人际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自身利益）的仇恨而过于仓促的一步。44 就像1973年的合作社跃进，被作为对付可能使用它的国家敌人的措施：“如果我们使用金钱，它将落入个人的手中……如果钱落入坏人或敌人的手中，他们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贿赂他们来破坏我们的干部……他们有钱贿赂人民的情绪。然后一年，十年，二十年，我们清洁的柬埔寨社会将成为越南。”45

另一方面，货币被废除了，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货币作为一个类别仍然存在——而且，当确定国家的计划和人民的生活时，它就是统治者。

1976年，柬共通过了国家发展的四年计划，该计划在堪称滑稽的民族主义的高中国一等的情绪推动下被称为“超级大跃进”。主要目标是在1977年至1980年期间将稻米产量翻番，以使柬埔寨可以出口价值14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将大米卖给传统买家（香港、新加坡和非洲国家），泰国是其他产品的重要市场。利润将用于购买10至15年内现代（机械化）农业和15至20年内现代工业所需的机械和原材料。

将水稻产量翻番的关键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广泛的保水坝和灌溉渠道系统来“解决水问题”，以便那些一年一季的地区从解放前平均每年每公顷一公吨进步到平均每公顷三公吨，在越来越多地区进行6吨或更多的灌溉，以便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为此，在一年之内，合作社转移到了“更高层次” ——更大的农场，拥有多达一千人，以及能够开展大规模项目的流动工作团队。除了衣服、餐具和卫生用具、笔记本和其他一些个人物品外，所有私有财产都被废除。集体饮食安排是普遍和强制性的；人们被禁止从事副业活动，如钓鱼、采摘水果和坚果、养鸡等，这些都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主柬埔寨的一些批评者嘲笑其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是无法获得的或不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柬共“快速建设社会主义”计划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太快了，而是它无法导向社会主义。

首先，在一个没有解决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遗留帐目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柬共并不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农民社会”，正如一些评论家声称的那样；他们没有解放农民，而是计划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现代化。（这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

其次，该计划将社会主义与现代机制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口号与同时期中国党右翼发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呼吁如此相似，认为增加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方面。与此相反，毛主义口号“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了生产关系（最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革命化，这是发展生产力（理解为包括工具和人）的关键。这也将在第四部分再次讨论，但至少现在，必须说，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基于强制的社会中，柬共只是使旧的社会关系以新的形式永久化。

事实上，柬共的经济学路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需要剩余产品（超过人们生活需要的东西）来增进生产力，但在柬共计划中，大米被视为严格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作为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其他商品的商品。对于所有柬共的民族主义，这个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的计算必须——并且曾——以美元表示。46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国外购买一些必要的物品，但是围绕世界市场的购买和出售的经济体永远不会实现全面、平衡的内部发展，必须独立于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并支持世界革命。即使除了如何应对外部帝国主义压力的问题（柬埔寨显然希望通过出售给殖民地和其他列强拇指下的国家而不是直接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售来解决），这样的国家永远不能在内部摆脱市场考虑。这项计划将使柬埔寨更加彻底地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奴役。显然，柬共不自觉地遵循古巴模式（其致命决定是将国家抵押给糖的出口），但这种柬埔寨版本的修正主义并没有什么“独特”。47

这个计划的应用在柬共的七个区有所不同，这似乎反映了党内不同的路线，而不是当地条件。然而，柬共中心本身，在《革命旗帜》发表的一份文件中，强调了选择集中攻势的地方的战略重要性，经济建设像战争一样，并宣称：“我们的第一战场是西北区”。48 该党已经决定西北区和北区将提供大部分的大米剩余。

较大的西北区包含柬埔寨最富有成效的稻田，在解放前它们是稻米出口的主要来源。但该区有180万居民（占该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金边和马德望的前城市居民，这使得迄今为止“新人”最集中于此。此外，对它们的要求要高于其他任何地方。该国选择一年两季的田地中有40％位于西北区，国家将在该区收获一半的稻米价值，而其他区则为20％。

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有悖常情的决定，与毛泽东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采取了口号“农业学大寨”——这是一个农业困难的地区，前贫困农民的先进意识通过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柬共选择通过集中他们被排除在革命之外的最多人在农业最富裕的区来取得经济突破，在一个党相对薄弱并且无法领导的区（由朗诺政权控制直到最后，反动军队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次抵抗）。而且，这些城市人中的许多人不习惯这种劳动，对农业知之甚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一直是柬共据点的贫困地区，西南区，在这次经济攻势中占据了小得多的面积，并且宽慰了其大部分“新人”，而柬共同样坚强、根深蒂固的东区也是如此。

柬共不是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行动主义，特别强调最先进部分的努力，而是按照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运作。修正主义现代化计划是这个看似不合理决定的主要因素。资本以神秘的方式运作，但绝对是在掌控之中。

灾难的收获

1975年底的收获——真正是对抗美帝国主义者所造成的破坏的战斗——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但到了明年，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西北区，大量人口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无论是在田间劳作的成年人，还是在建设灌溉项目的移动工作队伍的青年人。扩大的“合作社”由30名“老人”和党或军队干部的委员会管理。党本身后来报告说，这里的“新人”受到残酷对待。民主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长英蒂迪，1977年年中代表柬共中心（她是该中心的主要成员）对该区进行了巡视。“状况很奇怪。在马德望[省，而非城市]，我看到他们[干部]让所有人都去了稻田。田地离村庄很远。人民没有家，他们都病得很厉害……我知道总理[波尔布特]的指示是没有老人、孕妇、哺乳婴儿或小孩在田里工作。但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露天田野，在露天和炎热的太阳下，许多人患有腹泻和疟疾。”49

柬共领导层明白事情出了很大差错。过度劳累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国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劳动力的力量相当虚弱。只有在东方劳动力才不虚弱”，1976年晚些时候的报告归因于波尔布特。50 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关于粮食储备，报告继续说，“许多地方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国家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做。”51 “我们的一些同志表现得好像所有新人都是敌人。他们不喜欢相信他们要取得政治进步、获得政治意识或解决生计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无法团结人民来在政治、意识和党铺设的路线所划定的任务方面承担起革命的一边。”52

这份报告的正确和错误一样引人注目。党认识到事情进展得很糟糕，它表达了对人民的关心，正确地认识到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如果要保留权力，就必须团结民众。但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未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因为柬共认为主要目标是“个人主义，无论是封建主、资本家还是其他不特别贫困的阶级，如独立农民、独立工人和独立体力劳动者”，53 他们无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这条路线团结人民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合作社不是基于“自愿合作和互利原则”，正如毛泽东关于中国合作化运动所写的那样，54 以及柬共无法以某种方式领导合作社满足人民的基本必需品，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怎能期望人们会对他们有任何热情？

党的干部无法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以武力施加政策的倾向，在这份文件和其他文件中经常受到批评。报告称，部分解决方案是让干部“在人民中生活”和“接受培训，以便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与人民团结起来”。55 再一次，没有看到没有无论党员和委员会如何实施，其根本障碍就是党的路线本身。但柬共领导层决心在路线的应用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该报告主要关注的不是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而是关于阴谋破坏活动：“隐藏的敌人试图剥夺人民的食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我们的命令。这些人存在于军队中。看起来像是符合法律的人。他们接受我们的通行指示并利用它们来虐待人民并剥夺他们，迫使他们工作，无论生病还是健康。”56

这实际上是执行部分：“这是党内的疾病，诞生于我们发动人民民主革命的时候。[换句话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无法准确找到它……我们在党内寻找微生物而没有成功。他们被埋葬了。然而，随着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更加强烈地渗透到党、军队和人民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找到丑陋的微生物。我们被鼓励驱逐给党和革命带来问题的奸诈分子。如果我们再等下去，微生物就会造成真正的伤害……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捣毁的一连串叛徒就是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期间秘密组织起来，那时候，那种人可以和我们相处。在社会主义时代，他们必须被抛弃。现在的1976年是激烈、勤勉的阶级斗争的一年。出现了许多微生物。很多网络都呈现眼前。”57

英蒂迪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更为直言不讳。“特工已进入我们的行列，”她说，“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最高级别。我们在1976年还没有完全控制。权力掌握在区书记手中……他们控制了数百万人民，我们，政府，我们控制的只是工厂[在金边]。就是这样。”58 她的丈夫，外交部长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英沙里，指责西北区书记尼姆·罗斯和东区书记苏·菲姆，加剧人民之间的分裂以进行破坏。这两个人最终被称为越南特工。尼姆·罗斯被处决，菲姆在拒捕时被杀。60

党内秘密战争

谁是这些隐藏的敌人？有些人很可能存在。中国党内部通过适用不符合形势要求和群众情感的政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有很多例子。事实上，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汲取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键斗争就是在党内进行的斗争，关于执行何种政策和路线。但柬共所说有些不同。问题不在路线，当党达到更高团结时，可以识别、批评、斗争和击败路线。在民主革命期间加入党的人的提法也没有指出毛泽东在警告“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走资派”时的意思，他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入党的人，却反对进一步通过持续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社会转变。相反，柬共声称，由于越南影响力导致的弱点，这些隐藏的敌人在此期间能够潜入。他们继续将权力交给越南，因为在柬共领导层看来，现在已经取消了货币，旧的拥有财产的职业分散在合作社中，对抗性阶级的出现不再有任何内部社会基础，因此对抗性阶级斗争在柬埔寨社会或党内。

在上述1976年末报告之前，柬共领导层已派出东区的干部“扫荡”西北区，铲除了涉嫌对出现的问题犯有过错的领导干部。英沙里后来抱怨东区干部已经惩罚并杀死了错误的人。62 报告结束后，来自西南区的干部被派去重复这一梳理。虽然已经报告配额完成并且所需的账目已经转交给国家，但他们手边只发现少量大米。显然，一些西北“老人”被处以死刑。起初是“新人”欢迎西南区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待他们更好。一些“新人”被提升到合作社领导层，以取代被拆除的“老人”，总的来说，这一分隔似乎在这一区域有所减少。但到了下一次收获，这个问题才重演。收获甚至更糟。一些报道说，一半的稻田都是未种植的，因为人们因饥饿和疾病而无法工作。63 然而，中心的稻米需求没有减少。相反，有一个新的“扫荡”。

柬共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吐斯廉的一所前学校大楼内为那些涉嫌严重政治犯罪的人设立了一所监狱。所有进入那里的人都遭受了折磨，几乎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农村的杀戮更难以审查。使吐斯廉与众不同的是，党保留了每个囚犯的详细记录，他们的阶级背景和供词，因为详细的供词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越南人在1979年入侵和占领柬埔寨之后，建立了一个吐斯廉博物馆并用它来诋毁柬共。但是从来没有人声称那些文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些人的真实性得到了英沙里的证实。负责吐斯廉的康克由（俗称“杜赫”）最近证实了基本大纲并在其中一些文件上验证了他的签名。65

一种反动方法

没有社会主义政权系统地使用酷刑。在中国这是非法的，应该指出，毛泽东在讨论“潜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之前就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66 其中一个原因是敌人可能会使用酷刑打碎一些革命者，使他们承认告知他们的同志的反动行为，没有任何折磨可以使反动派成为革命派——因此，人们在折磨下所说的真相的问题，总是一个大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甚至是更大的问题。此外，它降低了革命，创造了一种气氛，阻碍了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正确和必要的斗争。柬埔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毛泽东分析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时，他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把基本问题交给群众，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受到群众批评，学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的教训，制定新的政策，逐步深入挖掘“土壤”，通过研究基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彻底地剖析和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来提高党和群众的意识。而，正如上文引述的文件所述，柬共领导层分析说，“生死斗争”威胁他们的党，他们采取保密、酷刑和处决的方式。

起初，在1976年，在吐斯廉的750多次处决中，大多数是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成员：朗诺士兵、专家、学生、工厂工人等。他们承认联络中情局。北区书记科伊·图恩也在酷刑下承认了与中情局的关系并于1977年被处决。但西北区领导人尼姆·罗斯的坦白是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越南人在柬共内设立了一个平行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约有2万人在吐斯廉遭受折磨和杀害，这个主题变成了鼓声，每一次供认都导致党的领导人、成员及其配偶和子女的进一步逮捕、折磨和认罪，——在不断扩大的谋杀的疯狂痉挛中。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在这个令人恐怖的地方遗留下来的细致记录使人们明白，人们受到了折磨，直到他们给出了所谓的供认。规定宣布，酷刑应“用手”并缓慢地施加，以助长这一结果；如果囚犯在写出被认为是可接受的供词（通常涉及许多草案和最终的“干净”版）之前死亡，那么酷刑者被认为没有履行职责。

由于这不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当然也不是一个必须被带到群众中的斗争，民主柬埔寨的失败被简化为警察问题并据此处理。应该根据这一基本问题来审查该政权所执行的处决，而不是用“柬埔寨心理学”来解释，或者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愤怒来抓住党及其群众基础（甚至作为由美国造成的屠杀引发的愤怒的结果）。

真正的问题

民主柬埔寨（在解放前几乎是自主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争论的问题是柬埔寨研究人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没有文件也没有太多证据可以指出明显的竞争路线。但很明显，存在重大问题。“偏执狂”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心，但即便是偏执狂，一位诗人曾写道，也有敌人。有计划；这是围绕柬埔寨革命的路线的基本问题进行的生死斗争。问题不在于柬共想象所有这些，而是他们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它。

一组问题显而易见：关于如何总结柬共历史和越南在其中的作用的长期争论。

越南人几乎不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政党，因为他们的影响和路线从一开始就属于柬共。在党内这场致命战斗中涉及的唯一一个政治问题就是有关竞争文件的问题，围绕着党的建立时间。解放前的东区文件是在1951年，当时人民党在越南的影响下成立。67 1976年“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种问题的决定”直接攻击这一点：“党史问题：将1960年作为党的诞生年；不要用1951年，以便我们与其他人接近——做一个干净的切割。”68

与越南工人党和柬共本身的行列和领导层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是如何联系西哈努克，换句话说，是否将柬埔寨的革命斗争从属于希望一个反对美国的与亲王的联盟。就越南工人党倾向于看待事物的方式而言，越南党显然对西哈努克比对柬埔寨共产党人更有信心，这与他们自己的直接战争目标有关。但是，在一些柬埔寨党员中，尤其是那些在西哈努克的两面派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不需要外国的影响来制造一种彻底破坏旧社会并面对战争的不确定性的不情愿。这是每个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党的经验的一部分。

在最基础的战略意义上，与柬共中心相关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柬共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如果不发动战争和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不可能——那么柬埔寨就不会从美国解放出来。69 事实上，西哈努克极不可能加入由柬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正如党正确地写了关于西哈努克部队的文章，“虽然他们不想加入我们，但是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们必须来避难所。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避难所了。”70

在这一点上，柬埔寨革命与中国革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革命对蒋介石持何种态度是最棘手的问题和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包括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的所有基本问题，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的首要性，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质和战术联盟问题，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内部这些反复的生死斗争是党的进步动力，无论是在其路线的发展方面，还是在其成员的意识和团结的发展方面。确实，一些错误路线的标准承担者，有时主宰党，最终谋反，并以某种形式向敌人走去；但如果毛泽东只是试图通过恐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完全失败——事实上，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出的路线不会出现。

再一次，“国外经验”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作为其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自苏联首次建立社会主义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得到了支付，价格很高。柬共已经抓住了一些直接问题——如果他们没有，他们就不会赢得胜利——但是通过拒绝这些教训，柬共注定不会“超过列宁并超过毛泽东”，而是切断任何纠正他们日益增多的怪异错误的可能性。

下降螺旋

毫不奇怪，随着问题日益影响新政权，柬共领导层越来越多地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不是他们曾开始的路径，不然他们永远不会聚集和组织群众支持来赢得胜利。他们从来没有比美国及其傀儡对群众施加更大的恐怖。幸存的党的领导人，甚至波尔布特本人，都反复强调了他们政权的后果的无意这一主题。一位外国记者在他去世前不久描述了与波尔布特的简短对话：“我告诉他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恨他，认为他对杀人事件负责。他说他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当他这样说时，他崩溃了，哭了起来。有些人他非常接近，他完全信任他们。然后，最后，他们弄得一团糟。”71 然而他们找不到其他方法。

“超级大跃进”正在滑向反革命的深渊。西方帝国主义媒体关于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报道是在解放的那一刻开始的——它们是由于“失去”印度支那而受伤的反动骄傲所致的谎言和（或）夸大其词。但后来，特别是在第一年之后，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大屠杀确实爆发并蔓延开来。例如，直到1976年底，该中心才阻止在朗诺武装部队中杀害前普通士兵。这个正确的政策——虽然最高级官员在他们自己的统治下以及革命者中对群众负有血债，但士兵通常是不热心的应征者——后来被撤销了。前士兵从“新人”中被淘汰出局，并经常与家人一起被杀（据说这种处决妻子和孩子的行为是为了阻止他们报复革命，但事实上它似乎带有对家庭的封建主义观点）。与真实革命的对比再次令人惊叹。这项政策不仅使数十万没有积极反对政权或甚至支持政权的人成为敌人，而且创造了一种“新人”和其他人越来越害怕并反对政权的气氛。

事实上，整个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该中心可能会也可能没有就合作社中的人员杀人事件发出指示，但无论如何，晚上在遥远的田地被杀害的人群在西方媒体那里成为波尔布特政权的象征是中心的路线的必然结果。工具和农场动物稀缺而珍贵；1976年报告引用了他们的保护（以及一般的工作配额的实现）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中国，人民的资源的经济使用和保护问题也被认为是阶级意识的问题。但柬共对此的处理与他们的整体路线一致。毫无疑问，每天工作许多个小时的城市人可能会毁坏锄头或允许水牛摔断腿，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运气不好，甚至出于背后的怨恨——这不会使他们成为不可挽回的革命的敌人。然而，这就是如何经常对待此类事件，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坏”阶级背景或其他“问题”。合作社领导层变得越来越焦虑和绝望（也许是怀疑）并大肆抨击。

在民主柬埔寨过去15个月左右，当然有一些变化。由于该政权即将结束，很难知道这一切将归于何处。也许是为了使它成为一个更“正常”的修正主义国家。

1977年9月，柬埔寨人民终于知道了“组织”是共产党的秘密。虽然秘密是每个政党为旧秩序做准备或发动战争的基本组织原则，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977年的举动并未表明它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主要是为了外国消费。它发生在一场使民主柬埔寨地位“正常化”并结束其外交孤立的运动中，特别是在邓小平政变后立即与中国建立军事联盟的企图。

在同一背景下，1978年中期政府宣布了重大的政策变化。拥有对现代工业的计划的柬共领导层，肯定知道他们离不开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外国教育的柬埔寨专家，他们在解放后返回时被宣布为“新人”）突然被美食和其他诱惑所吸引，并被邀请回到金边。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柬共领导人的代表会面，他们告诉他们，虐待他们是一个错误，是被中情局和越南组织的革命激怒。

这似乎是收回民众支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1978年3月在柬共机关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了“聚集力量”的必要性，并说：“合作社的全部权利和试用成员甚至是存放者也必须学习、观察和吸取经验。全权成员必须先分开学习，才能团结起来；试用和被存放的成员一起学习，吸取经验，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他们都会进步。我们必须教育和建立发展全权成员进入进步……”。72 至少，在许多领域，“旧”和“新人”之间的区别在年中结束。

一场坏战争

自两国解放以来，柬埔寨与越南之间为实现边界划定而进行的谈判已经正在进行。越南拒绝接受法国殖民主义者所划定的陆地边界（尽管法国在一个世纪前制定这些边界时，他们本来打算以对越南有利的方式解决旧争端）。这违反了1967年与西哈努克达成的协议，相当于对柬埔寨的永久压力。就其本身而言，柬埔寨拒绝承认被称为布雷维耶线的海洋、河流和水域中的法国边界（这至少是危险的，虽然在一个显然没有其他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国家，可能隐约地希望这个领土拥有石油矿藏）。然而，直到1977年，两国之间的形势仍然紧张但总体稳定，因为双方似乎都在避免任何决定性的外交行动或军事行动。

究竟如何解开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清楚，最终也不是我们分析的关键。但时机非常重要。随着两国陷入内部危机，敌对行动开始了。一年后，当越南完全进入苏联阵营，美国开始试图与中国（在那里，修正主义者夺取了权力）建立联盟时，他们开始全面战争。

柬共深信越南正试图从内部组织政变。这是党的前领导人科伊·图恩和符宁的供词的要点。1976年首都和暹粒似乎发生了炸弹爆炸。向首都运送2万名民柬军队——相当于其全部平民人口——表明了极度的担忧。在越南入侵前夕，1978年末发生了越南或亲越南渗透的最明显表现。民主柬埔寨政府邀请了三名西方记者，以争取国际支持。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晚，他们住的宾馆发生了一次神秘的袭击事件，位于西南方，离首都不远。马尔科姆·考德威尔是一位同情新政权的最著名的西方作家，他刚从私人采访波尔布特的过程中高兴地回来，他被挑选出来并被枪杀。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分析人士说，柬埔寨人在1977年初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边境袭击；战斗在年中扩大。柬埔寨的进攻意味着进攻越南人遭遇失败，而越南则开始反击。柬共的东区前线在没有重大战斗的情况下崩溃了。到1977年底，柬埔寨与越南断绝了关系。

1978年有一段平静。中心派出两个旅来逮捕东区领导层。许多东区军队逃离并与正在前进的越南人联络。越南军队在越南招募这些军队和高棉族人，组建了专门在柬埔寨土地上作战的部队。柬埔寨的回应是将大量东区平民驱逐到西北区。

越南的战争目标通过其行动得以明确：最终不仅是入侵和摧毁民柬军队，而且在长达十年的占领期间在柬埔寨驻扎了15万军队，在苏联解体使越南领导人决定寻求西方投资时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只是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柬共侵害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民主柬埔寨开始以反动方式面对这一威胁。金边电台广播呼吁“净化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为了保卫柬埔寨领土和柬埔寨人民……我们其中一人必须杀死30名越南人……200万军队将绰绰有余地打击越南人，因为越南只有5千万居民……我们只需要200万军队来摧毁5000万越南人，我们仍然会留下600万人。我们必须以此制定我们的战斗路线，为了赢得胜利。”73

这是一个自封的共产党的惊人号召。在民主柬埔寨领导层看来，这种呼吁似乎是使柬埔寨人在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唯一途径。但是，通过呼吁参加种族战争，他们确保了自己的失败。如果越南政府威胁柬埔寨的主权，它就会踩踏越南人民的革命愿望。所有印度支那都需要真正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柬埔寨的革命政党不能尽一切可能与越南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包括支持那里的革命政治？事实上，柬共似乎对摊牌的前景表示欢迎。看来该党确信，这种最后的冲突最终会通过掀起民族团结浪潮和结束越南干涉来最终结束自己的内部问题。此外，柬共似乎肯定会赢得它，结果证明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看法。

波尔布特告诉另外两位西方记者，越南不能独自战胜柬埔寨，因为“越南没有任何东西”。他说，越南的计划是让苏联派遣来自欧洲的华沙条约军队入侵并占领柬埔寨。美国及其东南亚盟友不会接受这一点；此外，这将削弱苏维埃帝国的欧洲战线，北约将反对它。74

受美国/中国协议前景威胁的苏联继续支持越南。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吹嘘说：“我鼓励中国人支持波尔布特。我鼓励泰国人支持民柬。”75 1979年2月，中国将以25万军队入侵越南。“给他们上一课”——只是为了让越南人学到更好的教训。但是，柬共希望这一反动联盟意味着柬埔寨的救赎并且他们将获得胜利，这被证明是另一种疯狂的错误估计。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发动了他们过去对西贡采取的“盛开莲花”战略。越南人指挥的部队包括10万越南人和3万柬埔寨人。由于对阵地战的预期，柬埔寨8万军队的大部分人员聚集在东部边境。越南军队包围他们，在他们阵地的北部和南部冲到柬埔寨的中心，然后展开，他们的部分部队向东移动，从后面碾压柬埔寨军队，其余部队向西飞速向所有方向移动。两个星期后的1月7日，他们占领了金边。

柬共领导层必须像他们之前的朗诺一样可耻地被直升机运送出来。

四、一些理论问题

关于私有财产和平等

为了具有刺激性，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6

这不是柬共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尝试这样做，在一夜之间？

他们理解的错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相互关联。一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错误设想及其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矛盾的性质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通过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错误设想。在这两个方面，柬共的路线和政策，尽管偶尔有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却是深刻的反马克思主义。

在《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释说，他们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会消灭“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这种私有财产的类型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体系被推翻后，它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因此，资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私有财产：它是劳动者的集体产物，他们被一个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剥夺、抢夺。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目标不是要废除“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为了解释、扩展并将此分析应用于柬埔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私有财产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所预见的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那些小规模财产而非资本主义财产最普遍的国家（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大多数人也都是农民）。中国被“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毛泽东称为官僚资本的与帝国主义、地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所统治。

柬埔寨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不同，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并没有太大不同。绝大多数人都被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农民耕种土地谋生的能力不断被这三种力量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贡品破坏和阻碍，有时作为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和其他形式的剥削，有时是在收税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他们也吸纳了农民辛劳造成的剩余）。这种盈余主要不是再投资于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更为罕见）。它支持封建的上层社会（特别是法院）和殖民主义政府及其继承者，西哈努克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政府，以及其他形式的寄生状态（包括高利贷者本身和佛教等级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类国家中，正如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宣言》所简洁地指出的那样，“革命的目标……是外来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它们是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并依赖帝国主义的阶级。在这些国家革命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导致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目标和任务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形成所有能被赢得支持新民主主义纲领的阶级和阶层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的基础上，包括在适当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建立无产阶级对革命群众其他部分的领导权，尤其是贫农。这一联盟的基石是工农联盟，而土地革命的开展（即反对农村半封建剥削和（或）实现口号‘耕者有其田’的斗争）占据了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核心部分。”77

即便如此，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没有在柬埔寨彻底展开。最初，正确选择了目标，农民在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的战争中动员起来，但即使在解放前的两年左右，也有弄混目标的倾向。到了1976年，解放一年后的柬埔寨“超级大跃进”与中国解放七年后的轻微大跃进形成鲜明对比，柬共写道：“当然，我们党毫不犹豫。我们没有经过土地改革或社会变革的时期。我们从人民民主革命跃向社会主义。”78 这意味着差异不仅是步幅，而且是道路。

柬埔寨的“合作社”并不是革命性的土地再分配的续集。相反，他们只是没收了许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而这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将有效地将他们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接受《宣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就不能接受柬埔寨已“基本上是一个集体社会”79 的主张：“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民主柬埔寨的所有内容，哪一类最能描述人民群众的存在状况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跃进不是到社会主义，而是到资本主义。

农业合作

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但是，高层次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成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过程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之后（甚至之前，在一些解放区），农民被领导来夺取土地。如果他们（女性和男性）手中没有这种所有权，就无法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封建束缚。否则，他们会觉得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封建关系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但与此同时，它为社会主义打开了更大的大门。农民可以看到汇集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他们也可以看到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被浪费的时间很少，他们被组织起来组成互助小组和小型低级合作社，其中土地集体耕种，但人们按照他们提供的土地、动物和工具的比例获得收获的一部分。（这在柬埔寨解放区广泛开展，直到1973年，之后在部分区域，并且非常受农民欢迎。）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党开始“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换句话说，人们在那里根据他们的生产工作而不是根据他们带来的土地或资本来获得工资。]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80

在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被迫住在一个“合作”农场，在中国，依靠穷人和中下层农民建立的合作社显然质量较好，最初的短时期内，在其他农民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力量之前，必须防止富农涌入他们并将他们带走。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

柬共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不亚于新民主主义。它错误地认为所有公共财产都是自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在解放前的柬埔寨显然如此）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种私有制形式，一种劳动者产生的剩余被少数人用于他们自己利益的形式，而“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是社会主义，取决于劳动群众是否越来越多地、一批又一批地成为生产的主人（生产过程本身、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剩余的分配），国家和社会，一步一步但坚定地走向废除中国革命者所谓“四个一切”（译者注：“四个一切”出自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般的阶级差别、他们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所有观念。这一点值得进行最深刻的研究（见《毛主义经济学：上海教科书》），但即使是这一相对简短的概述也很清楚，尽管柬共宣称“领先中国20或30年”，但它已经开始一条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以及中国，使他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转型期。《上海教科书》解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对私有制的根本否定。但是不等于说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由于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这类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使它退出历史舞台。”81

资产阶级权利指的是维护形式平等但实际上包含不平等因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82 虽然柬共认为它通过摆脱金钱和工资解决了社会不平等问题，因而一夜之间解决了阶级问题，但资产阶级权利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例如，即使仅仅谈论“自然”的不平等，在其分配制度下，身体健全的年轻人也比残疾人或老年人获得更多口粮。由于生产水平如此之低，没有足够的剩余来平等地养活每个人。另一个例子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特权，如乘坐交通工具、收音机等，以及额外的口粮和药品，以确保他们的生存。绝对的平等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红军成立之初批评这一观点时，“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83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权利只能逐渐逐步消除。简而言之，通过增加群众的共产主义意识（这是驱动因素）和生产的发展（以使人们的需求确实可以被满足），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飞跃将成为可能。不仅在民柬政权下废除资产阶级权利明显是一种幻想，而且它隐藏了实际的不公正，剥夺了权利，例如“老人”获得对“新人”的特权（事实上，这再次散发出封建主义的气味，因为家庭关系可以在一个人被归类为“新人”还是“老人”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该政权持续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如果它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那么这些不平等（已经可能是致命的）只会变得更加明显。

柬共通过取消工资、金钱等来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既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事实上，根本没有满足群众的需要），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标准（在确定他们收到的东西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产劳动，仅仅给他们饥饿口粮，有时甚至更少，这实际上阻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并经常让他们无法工作，实际上束缚了生产）。正如毛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所说，这就像想要一头牛产奶又不让它吃草。

波尔布特如此看待问题：“我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资金建立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资本主要来自我们人民的工作。我们的人民，通过他们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这就是我们没有工资的事实。工资的缺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来源。”84 虽然生产所产生的剩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资本来源，这完全而刻意地忽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剩余之间的区别，“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他们采取了尽可能多地挤压劳动人民的基本资本主义原则……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死亡。85 在这种观点中，类似于今天吸引西方资本到柬埔寨建立服装厂的人，该国的主要比较优势不是大米，而是其落后的社会关系导致的非常廉价的劳动力。

从历史上看，到目前为止，与资产阶级权利有关的主要错误就是抵制一步步消除它。在“四个一切”被消除之前，不可能“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86 在他最深远的贡献中，在防止邓小平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掌握党和国家控制权的斗争中的贡献中，毛泽东警告人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这里毛泽东总结了党内先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教训，以服务于一个新的针对邓小平的斗争]，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87

但是，柬共以另一种“独特”方式犯了同样错误。货币被取消了，但商品生产仍然占优势：合作社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大米和其他产品（以美元计价）并获得其他商品作为交换；大米本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商品，不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提供食物，而是因为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将这种形成资本的努力转移到抗击疟疾和其他滋扰人民的疾病的斗争上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88 事实上，劳动力本身仍然是一种商品，因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积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货币只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而工资的缺席是企图掩盖最严厉的剥削行为。

实际上，柬共的路线并非完全“独一无二”。《上海教科书》讲述道，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刘少奇和陈伯达呼吁过早日废除商品生产。毛泽东反驳说：“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交换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教科书接着说：“对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巩固我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89

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张春桥（“四人帮”的一位领导人，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反动政变），是这样说的：“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90

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秘藏金钱和商品生产，而在于努力发展废除他们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而不是仅仅用语言“废除”它们，同时保护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关系。

没什么可失去的

从柬埔寨的经验中可以得出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教训。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球，其中社会化生产（由无产阶级代表）与私人占有（由资产阶级代表）之间的矛盾驱使和（或）与无数其他人交叉。真正没什么可失去的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数量不亚于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家。然而，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和立场，在本国和整个世界，党必须依靠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在任何特定时刻尽可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来打击并最终推翻困扰绝大多数人的弊病的根源。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必须与最受剥削阶级的感情联系起来，努力将其转变为马列毛主义的解放观。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指的是没有任何怀着最好或最坏的意图的其他人，可以解放世界劳动人民的事实。结论性歌词“国际应该是人类”（译者注：原词直译如此，通行《国际歌》中文版本萧三版翻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意味着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废除所有阶级和由它们产生的一切来解放自己，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己。

党

这让我们回到党的问题。一个党的存在、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对群众保密，只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其秘密就是资本主义。

与领导数百万柬埔寨群众建设新社会的任务相比，柬共非常小。由于只有约1万4千名成员，且成员从解放到1977年底被冻结，因此只有一半合作社最多有一个党支部。91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人通过创造迅速胜利的条件“抢劫”了柬共，在党和革命运动掌权（领导整个社会）之前。在中国，解放后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在二十年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场战争中，党受到了培养和锻炼，广大群众通过土地革命、革命政治权力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发生转变。

然而，当环境压力强加给他们时，如果柬共不上台，那将是对柬埔寨人民利益和国际革命的背叛。在没有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推测的情况下，很明显他们的路径必须与现状相反：他们必须特别考虑革命的永恒必要的愿景，作为共产党人必须战斗，以在一个长期过程中改造条件，既不屈服也不忽视它们。例如，根据英蒂迪的抱怨，“我们只控制[在首都的]工厂”，包括波尔布特在内的其他柬共领导人在崩溃之后经常重复——这是一个清空城市的党的惊人坦白！即使形势如此，共产党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它。苏联共产党，因为它主要出现在大城市，在农村面临着类似形势。改变这种形势意味着制定特定政策，在调查农民和人民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愿望的基础上，逐步引导他们前进，同时开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培训最先进分子为党员。相反，因为柬共试图使用武力强加其观点，就像巫师的学徒一样，它很快就被客观世界的运作所淹没，它无法理解，最终也无法控制。

一个向群众保密的政党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这样的党可以在资产阶级意义上领导，以决策和协调他们的实践，但怎么能在共产主义意义上领导，如果不进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反复学习人民和教育人民，甚至没有向群众解释其政策、目标和意识形态，赢得他们并以此方式使其路线成为物质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政党，这不仅是在思想意义上，而且是在物质意义上。这是它与资产阶级类型的阴谋革命组织（布朗基主义）的主要区别。党的意识形态和路线必须符合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和利益，但我们所谈论的不仅是一群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男女。如果它是正在接受共产主义训练的一部分群众的运动的自觉表达，那么它就能掌握一些正确思想并努力朝着革命方向前进，但它甚至无法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其能够在革命斗争的漩涡中航行，更不用说成功实施这些政策了。它至少会失去方向。

最后，柬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而不是一个党，不是因为它的大小，而是因为它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写，“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92

这并不意味着柬共没有社会基础。柬共似乎得到了最贫困的农民，尤其是青年男女和青少年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在父权制的柬埔寨社会中。但是，这个社会基础不是依靠先进者来赢得人民，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直接利益和对人民的其他部分（他们只是受制于专政）的特权，前一统治阶级和他们压迫的人之间区别很少。

同样的路线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这是一条“贫农”路线，它不是动员穷苦群众以团结人民，而是试图诉诸他们的怨恨和自身利益的最狭隘的感受，那种列宁描述的“他们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译者注：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新一代剥削阶级的工具。

柬共写道：“具体而言，我们不依赖工人力量。工人是公开的先锋[即，名义上]，但具体而言，他们并没有成为先锋。具体而言，只有农民。因此，我们没有抄袭任何人……”93 这当然是真的：在毛泽东的中国以及从那时起发动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非常重视为这项任务招募和训练无产阶级人员。通过改造世界观，帮助他们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农民，依靠无产者来领导广大农民阶层。柬共绝对缺乏对确定工人阶级的关键部分、培训和招募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趣，94 对于以任何形式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通过国际无产阶级发展的立场、方法和路线，培训农民的一部分，同样不感兴趣。

但这并没有使柬共成为一个农民党，尽管它的观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些农民的某些自发倾向相吻合，尤其是一种本应该成为培训全面阶级意识的大门的阶级仇恨。相反，这些情绪被用来反对农民的广泛革命利益。

因为柬共无法用群众路线引导人民，因为它试图引导人们去做的事实际上违背他们的利益，所以不难看出为什么他们陷入对人民实行专政。

毛泽东断言道：“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95

柬共可能想要团结人民，如果这只是因为不如此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但他们不能。一方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充耳不闻，无产阶级党以此领导群众挥舞政权改造社会，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性还是巨大的矛盾性都没有任何概念，并且无法区分人民（其长期利益基本相同）内部矛盾和与敌人（其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相对立）之间的矛盾。人们可以在他们的文件中找到与“群众路线”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参考文献，“干部走向人民”，需要“倾听人民”，特别是“团结人民”。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并认为他们与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统治的反动派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忽视这一点。重点是他们的路线越来越错误，这条路线不仅仅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它成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因为它符合世界已经组织起来的反动方式。

在当今世界，任何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势力都无法建立对任何社会的统治，所有资本主义逻辑，无论大小，都必须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资本的要求。或许，以其独特的方式，柬共正在建立近几十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见的那种规则，在那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成为官僚资本家，并压榨农民，通过国家和其他与世界市场的基本默许密切相关的集体剥削形式来提取剩余。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一份关于党史的文件中，柬共认为，虽然学习外国政党的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党在学习和复制国外经验方面也有许多不良经验。这一学习常使党在大小问题上造成坏的后果。一方面，它使我们完全无知；另一方面，它阻碍了，有时摧毁了组织党的革命运动和进程。最好不要从国外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96 这主要是与越南人关系的错误总结，但对毛泽东的中国也是一记耳光。他们不想向任何人学习任何东西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所教的内容。他们拒绝毛泽东的路线不是因为它是中国人，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变得更糟。虽然有报道称，在党开始正确认识的初期，干部正在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但由于它发展了自己统一的路线，所以后来似乎没有那么多。

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可能不喜欢的一件事是它对“民族共产主义”概念的嘲讽。如果党不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它就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一次赢得所有人，或者群众中没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正如《宣言》所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无论一个党是在受压迫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革命，它只是整个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世界共产主义。

事实上，对世界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而言，这个国家的解放确实是一场被浪费的胜利。

五、柬埔寨的命运

一旦波尔布特政权被推翻，美国支持其剩余军队就没有问题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美国指挥的国际援助帮助维持了柬埔寨西部边境地区丛林和泰国难民营的数千名战士。97 十年来，美国及其不断屈从的联合国承认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柬共的统一战线，西哈努克仍是其正式的负责人）作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

正如如果不是因为苏联集团的崩溃，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国际背景没有同样根本改变的话，美国的援助（以及在联合国的赞助）也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不仅没有进一步使用红色高棉，而且它有一些具体理由以其他方式活动。一方面，由于其努力通过在各种“人道主义”旗帜下运作的B-52粗暴地强加其利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理由试图修改印度支那的历史，并真正把自己描绘成主要的种族灭绝的反对者，而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肇事者。另一方面，通过要求对剩余的柬共领导人进行审判，美国可以更好地为金边的现政府提供帮助，由前东区指挥官洪森领导，这样的审判可能是一个问题和尴尬。（曾被谴责为“高棉身越南心”，现在洪森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在越南占领下，饥荒继续肆虐柬埔寨。占领者和他们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鼓励农民组建“团结小组”，以维持在柬共下建造的土制水厂，并追求其经济目标。柬共的权力继承者，即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自称是柬共建立的延续，他们宣布，它成立于1951年。

为了促使西方支持，也许是为了埋葬自己的过去，1981年柬共领导层宣布解散他们的党以支持反对越南的统一战线。

最终他们甚至被西哈努克抛弃了，他们曾在他名下战斗。1989年，美国斡旋了由亲美军和新亲越军组成的联合政府。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和国家元首。他的儿子拉那烈王子似乎并不喜欢他父亲的支持，多年来一直与洪森争夺控制权，而洪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政变中将他赶下台。

红色高棉的命运连同他们的反动外国支持一起逐渐衰弱。他们维持了几千名士兵，似乎得到了一些群众支持。但最终他们至多只是漫无目的的反叛者，至少则是土匪。他们通过在泰国走私鸦片、宝石和非法切割的硬木生活。如果没有反动泰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几乎会消失。然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与洪森达成协议。作为对他们支持的回报，他允许他们重新出现甚至掌握一些政治权力，这次是柬埔寨的反动“稳定”中的他的沉默伙伴。英沙里于1996年投降并获得皇家赦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乔森潘（民主柬埔寨的第二任国家元首）和党委副书记农谢以及许多幸存的巴黎训练的知识分子跟随他，他们曾是组成波尔布特的干部和支持者的最初核心。

边境小镇拜林（马德望西部，旧西北区）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他们的封地，就像当地军阀统治大部分柬埔寨省一样。在他被中央政府任命之前，该地区的区长是红色高棉军事指挥官。副区长是英沙里的儿子。该地区的士兵和警察是前红色高棉战士。他们的旧单位和指挥结构完好无损，但现在这2千名男子穿着新的政府制服而不是黑色宽松裤。现在许多本田摩托车上的男人都是前游击队员。前柬共领导人对大规模走私和“合法”商业活动以及他们的城市拜林的统治，拥有凯撒国际赌场（旨在吸引泰国商人），数十所卖淫场所，一家银行和无数卡拉OK酒吧迎合前游击队员。英沙里和乔森潘居住在俯瞰城市的有人看守的别墅。98 波尔布特在他的前同志被软禁后被判无期徒刑，于1998年4月去世。他们邀请了一位西方记者在他去世前简要采访过他，这基本上是一次“拍照机会”，以证明他们已经与他脱离关系。在导致他被捕的内部斗争中，波尔布特命令杀害该党的军事领导人及其14名家人（波尔布特后来解释说，杀害宋先的尚在襁褓中的孙子是无意的）。丛林中最后一位历史性的柬共领导人，西南区的负责人达莫，推翻了波尔布特，试图在1999年协商他自己的投降，但却遭到了逮捕。他等待着审判，尽管他们仍然是美国和洪森之间争论的对象。那么，只要问一下，西方自从返回以来在这十年中对柬埔寨做了什么，这是公平的。

柬埔寨的“工业化”应该是形势的好处。截至1999年1月，共有110家法律认可的服装工厂，拥有7万2千名工人，还有39家工厂（11万个新工作岗位）即将开业。美国和欧盟政策允许柬埔寨产品以降低的关税进入其国内市场。但资本当然是西方：西方获利，柬埔寨人受苦。最近蓬勃发展的服装行业的许多工人的工资从40美元每月减少到30美元每月，48小时小时工作周。即使薪水较高的工人，每小时收入80美分，也被削减至50美分。

柬埔寨似乎仍然没有自己的货币；工人用美元支付。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严重打击了柬埔寨，因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货币兑美元贬值，使得该国在争夺最便宜的劳动力方面落后。

该国另一个主要“工业”和更大的雇主是卖淫：当地和外国剥削者掠夺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多是失业的年轻女性和农村男性。估计高达60万，其中一半是艾滋病毒阳性。柬埔寨是亚洲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控制的媒体不太关注，因此仍然生活在农村的85％（目前柬埔寨总人口1140万）的情况更难以从国外看到。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农民曾经从一英亩水中捞出许多吨鱼的国家，鱼类已接近灭绝。由于西方奢侈品市场无限制的伐木业务，该国广阔的中央湖泊——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水体——洞里萨湖正在萎缩。据报道，该国的森林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被砍伐光。湖畔的赌场正在推出余下的渔村和鱼类繁殖场。救济机构警告大规模饥荒的威胁。

柬埔寨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垃圾堆，废物如此有毒，没有其他国家允许它被带到那里。最近，由于在西哈努克西南部港口附近的一个巨大垃圾场发生骚乱以抗议工人的死亡，以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已卸下中国武器，这种情况迫使西方媒体注意。

这种情况可以总结如下：由于美国入侵和随后的战争，柬埔寨的残疾人和截肢者比例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仍然没有真正的医疗系统。美国轰炸摧毁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从未重建。水稻收成从未恢复。该国一半的儿童正在挨饿或长期营养不良，出生时和五岁以前儿童的死亡率是世界最高的。

这种情况也可以这样总结：政治上在联合国的指导下，经济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投资直接和间接地受到美国和欧洲的控制，政府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曾统治柬埔寨的每个政党的亲帝国主义的联盟。

当然，没有人会称这为种族灭绝或要求审判。这只是帝国主义下的平常生活。

尾注

1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在削减一般研究经费的时候为“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该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之一是由该领域的主要学者本·基尔南制定的，他曾经支持越南，现在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耶鲁大学柬埔寨种族灭绝项目的负责人。他从1979年的人口中扣除了1979年柬埔寨人口的某些估计值，并得出民主柬埔寨政府期间有150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死刑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很成问题。那是战争年代，这些数字不是通过数头来获得的；此外，亲美的1975年以前的柬埔寨政府和亲越南的1979年后的政府有理由向上（第一种情况）和向下（第二种情况）夸大。甚至民柬政府在不同时期给出的数据也是相互矛盾的。基尔南任意决定接受私人研究员的未经证实（未发表）的数字。使用中情局统计数据的迈克尔·维克里将所有原因的死亡人数定为80万人。

我们不接受通过声称其他人罪行更大而试图解除一组罪行的反动方法。但即使按照这些条款——按照绝大多数人被谋杀的条款——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罪犯。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世界上最血腥的罪行之一。美国及其盟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数量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倍。他们至少杀死了200万越南人，并在该国造成了1000万难民。在柬埔寨，美国于1970年安装了一个傀儡政府，然后派遣部队。B-52地毯式轰炸袭击三年多来几乎没有中断。50万吨炸药和凝固汽油弹摧毁了农村，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饥荒。那场战争杀死了100万柬埔寨人。然而，柬埔寨种族灭绝项目并未考虑其任务的这一部分。

2 最初认为柬共是毛主义的主张来自苏维埃（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柬埔寨：毛主义者及其途径的犯罪》[诺沃斯蒂，1979]）。当然，他们的动机是通过联合来对抗毛主义和毛泽东的中国。苏联拒绝与美国安装的朗诺政权断绝关系。

3 基尔南确实倾向于将柬共描绘成毛主义者，他承认，“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英萨利、宋先、乔森潘，还是柬共中心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表示同情，而它正在发生。” （《波尔布特政权》，页127。）另一位著名学者写道：“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柬埔寨党在1965年至1971年期间与中国的激进派有联系。” （蒂莫西·卡尼，《意外的胜利》，卡尔·D·杰克逊编《柬埔寨1975年至1978年：与死亡会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页24。）

4 访谈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48。

5 “被注释的党史的摘要”，柬共东区文件，载于杰克逊，页264。

6 事实是这样的：“1967年末，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东北部的丛林中开办了一所柬共培训学校。在九天的政治讲座中，他很少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他有一次评论道。” （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27，引用了这所学校的一位参与者的访谈。）

1975年6月，波尔布特上台后，秘密访问了河内和北京，并且有些人称他与毛泽东会面。我们对这次所谓的会见一无所知。（译者注：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此事《毛泽东年谱》无载，可靠的会谈摘录来自《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丹童文章《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网络还流传若干不知原始出处的毛泽东会谈语录，如“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此后，中国向民主柬埔寨提供了广泛的经济（但不是军事）援助。

当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时，民主柬埔​​寨呼吁进行为期五天的哀悼。刚刚担任总理的波尔布特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将毛泽东描述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来最杰出的教师”。向中国党发出的一个信息是赞扬“文革”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革命司令部”。（肯尼斯·奎因，“解释恐怖”，载于杰克逊，页219-21；或贝克尔，页277-8。）

基尔南引用二手消息来源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激烈斗争的那一年，柬共领导人表达了对“四人帮”的仇恨，毛泽东最亲密的同志和继承人在1977年被捕（译者注；原文如此。），标志着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政变。（《波尔布特政权》，页155-6。）然而，这些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记录或明确的政治内容，因此不能用作严肃分析的支柱。一些作家试图将波尔布特政权与“四人帮”（尤其是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理由是柬共政策与大跃进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在基础上存在相似之处；我们将通过考察和比较这些政策来反驳这一主张。

毫无疑问的是：邓小平政变之后，当他还试图摆出革命者的姿态并从仍指望着毛主义中国的各国共产党争取支持时，波尔布特和其他柬共领导人来到了北京，他在机场拥抱了邓小平。波尔布特发表了演讲，其中首次公开披露了柬共的存在。在谈到党的历史时，他说：“我们也借鉴了世界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奎因，载于杰克逊，页219-20。）但是，这只是援引毛泽东以与他遗产的背叛者携手合作。演讲通过中国电台播出，但未在柬埔寨转播。

7 美国或越南捕获的大多数柬共文件仅以高棉语书写，被翻译的文件通常也无法获取。许多电台演讲（民主柬埔寨的主要大众媒体）由美国政府外国广播处录制和翻译。在提到这两种来源时，我们引用了初级研究员。除了在之前引用的杰克逊书中发表的四篇完整的柬共文件外，最全面和最容易获得的英语柬共文件集是大卫·钱德勒、本·基尔南和钱索·布阿编辑和翻译，《波尔布特计划未来：1976年至1977年民主柬埔寨的机密领导文件》（耶鲁大学东南研究专著33，1988），可以通过邮件从耶鲁大学出版社订购，邮政信箱208206，纽黑文，CT 06520？8206，美国。部分可以从耶鲁大学柬埔寨种族灭绝项目网站www.yale.edu/cgp下载。

8 转引自伊丽莎白·贝克尔，《当战争结束》（西蒙和舒斯特尔，1986），页345。关于这一点，也可见大卫·钱德勒，《柬埔寨历史的悲剧》（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页48。

9 转引自钱德勒，页87。

10 贝克尔，页97。

11 “被注释的党史的摘要”，载于杰克逊，页257。

12 通常，西哈努克将国有化的美国企业交到他的亲信手中。柬埔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转移到法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受邀进行热情的国事访问。

13 威尔弗雷德·伯切特，从越南人角度报道战争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并且对越南工人党的思想有所了解，他写道，他在1967年拒绝了写关于“正在对抗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的请求。“此时谈论柬埔寨的’革命形势’是荒谬的。” （威尔弗雷德·伯切特，《在路障》（伦敦，1979），页324。）

14 1977年波尔布特演讲，引自钱德勒，页166-7。

15 《柬埔寨共产党历史》，据称由英萨利于1974年发行的油印文件，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如何上台》（维索图书/新左翼图书，1985），页250-1。

16 贝克尔，页148。

17 转引自钱德勒，页224。

18 美国飞行员未经事先许可就可以炸毁或拦截任何可疑的敌方目标的区域，这基本上是指政府控制区以外的所有人、动物、房屋和田地。

19 民主柬埔寨政府，《黑皮书——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吞并行为的事实和证据》，1978。

20 “最后计划”，载于杰克逊，页301。

21 基尔南，《波尔布特如何上台》，页362。

22 《革命旗帜》，1975年8月，由T·M·卡尼翻译，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如何上台》，页368-9。

23 1978年9月波尔布特演讲，引自贝克尔，页162-3。

24 采访戴恩·蒲拉西斯，引自贝克尔，页253。

25 对于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工人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请参阅“越南：革命的流产”， 《革命》（美革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卷4，号7-8，1979年7月/8月。

26 钱德勒，页234。

27 蒂莫西·卡尼，“权力的组织”，载于杰克逊，页35。

28 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63。

29 引自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S·赫尔曼，《大灾变后：战后印度支那和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建》（南端出版社，1979），页161。

30 1975年8月26日的大使馆邮件，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92。

31 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96。

32 二者同转引自钱德勒，页240。

33 《革命旗帜》，1975年8月，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94。原文强调。

34 柬埔寨虽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在战争期间和之后也得到了中国的重要援助。（解放后不到一周，中国首批食品供应到达。到9月中旬，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援助，其中包括20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这是中国给予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大援助。）数据来自《中国季刊》，引文来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29。

35 访谈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48。

36 柬共文件“检查控制”，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47。

37 “使无产阶级意识尽可能的锐利和强烈” ，《革命旗帜》，载于杰克逊，页271-9。

38 “关于控制和实施党的民族民主阵线集会政治路线”，1975年9月22日，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6。

39 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458。

40 “磨砺意识”，页278。

41 见“注意推进壮大建设党和人民集体力量的工作”，载于杰克逊，尤其是页296。

42 这种对在柬埔寨生活了几代的越南族人的描述，就像许多柬埔寨人在越南生活一样，本来可以从朗诺的法西斯宣传中获取，但实际上它来自民柬政府的《黑皮书》。

43 贝克尔，页262-3。

44 “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读者》，罗伯特·塔克编（W·W·诺顿公司，1972），页337。

45 “检查控制”，转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98-9。

46 从字面上看。该计划和相关政治文件收于《波尔布特计划未来》。

47 见“古巴政治经济学笔记”，《获得整个世界》14号和15号（1990/1991）。

48 “关于代表党组织在区大会上的同志的主要观点的摘录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25。请注意，该计划已在党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尽管党的存在仍然是秘密。

49 采访英蒂迪，贝克尔，页247。

50 “根据1976年的一般政治任务，党中心的活动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197。

51 同上，页188。

52 同上，页206。

53 同上，页182。

54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选读》（外语出版社，1971），页399。

55 “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205。

56 同上，页207。

57 同上，页184-5。

58 贝克尔采访，页247。

59 贝克尔采访，页245。

60 所以菲姆已经清除了来自越南的柬埔寨返回者，这是一个反驳认为他是一个简单越南工具的指控的论据，但是东区和党中心之间似乎存在关于如何处理越南的争议。

61 应指出的是，本文件的结论是，鉴于党内这些“隐藏的敌人”和“网络”，它的存在应该保密。“敌人也希望我们出现，以便他们能够清楚地观察我们，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长期目标。党的出现带来了捍卫领导的问题。回到9月和10月，我们曾经也想过出现，但从那时起文件显示，敌人试图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打败我们……”结论是“推迟我们对党的出现的决定”。揭示党的存在会危及其领导地位的论点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此时波尔布特和其他党领导层现已被公开认定为正运行政府。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和党本身的存在是秘密。

62 贝克尔采访，页275。

63 查尔斯·H·特文宁，“经济”，载于杰克逊，页145。

64 贝克尔采访，页275。

65 “杜赫”在1992年成为一名再生的基督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联合国和柬埔寨西部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工作。1999年5月，他和《远东经济评论》作家纳特·塞耶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5月13日。）。

66 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选集》，卷5（外语出版社，1977），页46。

67 “被注释的党史的摘要”，载于杰克逊，页251 ff。

68 《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4。

69 其中有一些战术问题。中国鼓励西哈努克对美国采取行动并没有错，特别是在西哈努克确实为反帝国主义战争提供具体援助的情况下。在解放之前和解放时期，中国也向柬共提供了援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向柬共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遵循中国的国与国政策。柬共本身后来认为，它对西哈努克总理朗诺及其政变准备集中了政治火力，而不是在那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对亲王本人。（《黑皮书》）

70 “简略课程”，《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220。

71 纳特·塞耶，《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10月23日。

72 “注意推进壮大建设党和人民集体力量的工作”，载于杰克逊，页296。

73 英国广播公司记录，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393-4。

74 贝克尔，页431-2。

75 引自贝克尔，页440。

76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读者》，罗伯特·塔克编（W·W·诺顿公司，1972），页335-62。

77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喀拉拉，印度，1998），页35。

78 “党在一切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46。

79 “党的四年计划”，页45。

80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页399。

81 《毛主义经济学和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海教科书》，雷蒙德·洛塔编（旗帜出版社，1994），页24-5。（译者注：《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1975年第2版，页217。）这是1975年中国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翻译。

82 见洛塔对《毛主义经济学》的介绍，页xliii。

83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选集》，卷1，页111。

84 波尔布特演讲，“让我们继续坚定地高举光荣的柬埔寨共产党胜利的旗帜，以捍卫民主柬埔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转引自贝克尔，页198。

85 1976年的计划说：“我们必须从1977年起为人民提供50％至100％的物质必需品。” （“党的四年计划”，页111。）这代表了对人们生死的惊人的漠不关心，不难理解为什么该计划被保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类似的计算，但他们的语言不太坦率。

86 《教科书》，页21。（译者注：《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1975年第2版，页213。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有相同的话：“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曾被选入1975年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

87 转引自《教科书》，页9。

88 1976年计划将杀虫剂和药品工业推迟到四年周期的末尾。虽然该计划提到动员传统医学，但似乎没有科学地这样做；相反，人们经常得到纠正，而不管他们治愈或治死。中国提出派“赤脚医生”分享其结合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经验，但与中国的其他此类提议一样，政权并不急于让外人进入村庄。

89 《教科书》，页109。（译者注：《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1975年第2版，页286。）

90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于《而毛泽东是第五个：毛泽东的最后一战》，雷蒙·德洛塔编（旗帜出版社，1978），页219。

91 《波尔布特政权》，页313。至于柬共对本党的看法，见“磨砺意识”。

9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选读》，页461。

93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柬埔寨革命运动的历史的简略课程”，载于杰克逊，页219。

94 该报告谈到工厂工人的政治形势“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让他们留在市区，并提到“最近城市中出现的来自较低层的人”“过于多样化”以至于不值得信赖。结论是，他们像“社会上层”一样，不应该被允许进入合作社的领导层或获得政治权利。顺便提一下，这是在讨论“埋葬敌人网络”的危险的一节中！（“根据1976年的一般政治任务，党中心的活动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页208。）

95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页436和438。

96 “被注释的党史的摘要”，杰克逊，页264。

97 正如美国政府的布热津斯基所暗示的。见贝克尔，页440。

98 见《纽约时报》1998年7月24日和12月28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1998年4月19日。